

# 毛泽东与新民歌运动

□刘延年

1958年到1960年，在“大跃进”的过程中，兴起了一个新民歌运动。作为曾在文化领域“大跃进”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全民写诗运动，它的兴起和发展都是与毛泽东的直接提倡和大力推动分不开的。



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对民歌怀有长久而深厚的感情，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给予民歌以特殊的关注。

民歌在现代文学史上受到格外的重视，与上个世纪新诗发展的方向紧密相关。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曾就中国新诗的发展问题进行过讨论。一些著名学者如蔡元培、胡适、刘半农、俞平伯等人就主张诗歌在本质上是平民的，要回到民间去，吸取营养，从而为中国的新诗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来。俞平伯在著名论文《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中说，艺术本来是平民的，新诗不但材料须探取平民的生活，民间的传说、故事，并且风格也要是平民的好。为实现诗歌的平民化，使诗国建立在民众的基础上，俞平伯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社会的改造，使社会安稳地建设在民众的基础之上；二是文学的改造，新诗从材

料和风格上都应该平民的才好。随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并出版了《歌谣周刊》，许多文化名人都曾参与采集民间歌谣。在他们看来，民间歌谣的搜集，不但可以为民俗研究提供新鲜活泼的资料，而且可以为新诗的发展打下基础。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来到北京，并在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北京大学关于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和搜集民歌活动显然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对他的诗歌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上述俞平伯的那段话就与毛泽东后来关于新民歌的谈话遥遥相应。直到几十年后发动新民歌运动时，毛泽东还几次提到北京大学当年的民歌采集活动。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很早就重视民歌的作用，把它和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1925年，毛泽东从上海回故乡韶山休养，其间组织农民运动，办夜校，开始用当地的民歌民谣编写识字课本。1926年，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作为所长的毛泽东主持拟定了租率、田赋、农民观念等36个项目，引导学员到农民运动开展得比较好的海丰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其中就有收集民歌这一项内容。1933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进行调查活动时又搜集了一些民歌，并把它们写进自己的报告里。

早年的民歌搜集活动显然给毛泽东留下了非常深刻而美好的印象，直到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会议上还一往情深地回忆说：“有几个典型材料丢失了，我比较伤心。过去在广东农民讲习所搜集的民歌几千首，民歌使人得到很多东西，丢了很可惜。”

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作家到人民群众中去，学习他们的生活和生动新鲜的语言，丰富自己的创作，更好地为他们服务。他说，乡间的农民不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即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套语滥调、不用典、不重对偶等）主义，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却很生动，言辞也很美丽，这些农

民不仅是很好的散文家，而且是很好的诗人。他指出，民歌中也有很多很好的诗。毛泽东“鲁艺”讲话后，从1938年春到1942年初春，延安兴起了一个诗歌运动，一些诗人写下了大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大众风格的作品，为群众所喜爱。特别是萧三、丁玲、田间等到延安后，街头诗更加兴旺，可以说是“满街诗花，满墙诗花”。

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文艺要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要和革命的群众相结合，要面向工农兵，要做到使劳动人民喜闻乐见，要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他再次号召作家放下架子，到人民群众中去，创作出为他们喜爱的作品。在《讲话》精神的影响下，很多作家、诗人开始走到群众中去，如著名诗人艾青就随一个运盐队到“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去学习和“采风”，收集了很多的民歌和剪纸，一改过去忧郁深沉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一些接近民歌色彩的作品。1943年10月，延安诗界举办诗歌大众化座谈会，提出由创作“大众化”的诗，到思想感情都倾向于工农兵的“大众的诗”的主张。许多作家都学习采用民歌体写诗，力求使自己的诗做到通俗易懂，为群众所欢迎。随后，在陕甘宁边区出现了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等作品，在这些带有浓厚陕北民歌色彩的长篇诗体里，人民群众第一次成为艺术所描写和反映的主人。这些作品赢得了边区人民的喜爱，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常常以此来印证这一诗歌发展方向的正确。

建国初期，围绕着新诗发展的问题，中国作协曾于1953年底到1954年初召开三次诗歌形式座谈会。1956年下半年，《光明日报》又对“五四”以来新诗的评价问题展开过一次讨论。这些讨论，显然引起了对新诗发展颇为关注的毛泽东的注意。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诗人袁水拍和臧克家，就文艺界关于新诗的讨论和新诗的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已经看了

关于新诗旧诗争论的文章。关于诗，有三条：精练；有韵；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

1958年3月，在中共中央酝酿“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号召大家搜集和创作新民歌，说：“印了一些诗，尽是一些老古董（指他在成都亲自编选的一本唐、宋、明三代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和一本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搜集到大批民歌的，下次开会印一批出来。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两者结婚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还不能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这个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在随后的几次会议上，毛泽东都提到新民歌，如在4月初汉口会议期间他又说：“各省搞民歌，下次开会，各省至少要搞一百多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三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

千里结穴，萃于一点。通过50年代的几次谈话，毛泽东对新诗的发展提出了自己蓄之既久的系统看法。旧体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虽然已经成熟了，但它太束缚人，为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他甚至不愿意发表自己的旧作；而新诗在他看来，几十年来迄无成功。那么，新诗的发展应该遵循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呢？他选择了民歌和古典，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产生出一个新的东

西：既继承中国古典诗词的精华，汲取民歌中丰富的营养，反映时代精神，又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而内容和风格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这就是毛泽东理想中的新诗，也就是新民歌。

毛泽东对旧民歌的密切关注和对新民歌的大力提倡，是与他 对诗体的形成和形式的认识、特别是他的文化创造观，以及他对文化创造主体的认识密切相关的。在毛泽东的文化观中，如同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中人民群众是主体一样，在精神文化的创造中人民群众也应该是主体。但是在旧时代，人民群众创造的权利被剥夺了，只是在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民歌中才存在着他们的声音，表达出他们的理想和感情。在新的时代里，他们当然也应该是文化特别是诗歌创造的主人和主体。如果说在延安时期，开始了作家与人民群众的结合，那么到了“大跃进”时期，人民群众就要作为主人和主体走到文艺创作的前台了。

就文化建设而言，毛泽东很早就预言过：“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毛泽东又一次指出：“农业合作化高潮，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1958年2月28日，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文章的第三部分，是毛泽东亲自加上的一段：“在我国，1957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了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的主力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

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基本的道路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文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

“大跃进”一开始就是以经济和文化同时跃进为显著特征的。它不但表现为经济建设的超常规的跳跃式的发展，同时也表现为亿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文化革命和建设的热潮，而文化“大跃进”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新民歌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从来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 二

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指出：“从已经收集发表在报刊上的民歌来看，这些群众智慧和热情的产物，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生产建设的波澜壮阔的气势，表现了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高涨。‘诗言志’，这些社会主义的民歌的确表达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尚志向和豪迈的气魄。”社论在引用了几首民歌后说：“这些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好诗。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大规模的生产斗争中，农民认识到劳动的伟大，集体力量的伟大，亲身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就能够高瞻远瞩，大胆幻想，热情奔放，歌唱出这样富于想象力的、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杰作。”社论还号召：“这是一个出诗的时代，我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歌、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此前，4月9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醒目标题报道了云南省委宣传部向各地县委发出《立即组织收集民歌》的通知，通知中不具名地引用了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关于搜

集和创作民歌的讲话。

其实，早在1957年冬季兴修农田水利运动中，即出现了一批歌颂《农业发展纲要》、兴修水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农村新面貌的民歌。当时许多地方为动员群众，将政治和生产口号歌谣化，用以鼓舞群众生产劳动的热情。如四川永叙县提出：“山顶戴帽子，山腰缠带子，山脚穿鞋子，山底钉钉子。”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于1958年初即编辑了一本《农村大跃进民歌选》，那首《我来了》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从4月开始，全国文联及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地县党委都纷纷发出有关收集新民歌的通知，要求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开展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采风运动”，并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新民歌运动在毛泽东的提倡和推动下，至此已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周扬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民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阐明了党对搜集民歌和其他民间文学的方针政策。他说：“最近，随着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全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搜集民歌的运动……大跃进民歌反映了劳动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干劲和生产热情，反过来又大大地促进了这种干劲和热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民歌成为工人、农民在车间或田头的政治鼓动诗，它们是生产斗争的武器，又是劳动群众自我创作、自我欣赏的艺术品。社会主义精神渗透在这些民歌中。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他还展望说：“群众诗歌创作将日益发达和繁荣，未来的民间歌手和诗人，将会源源不断出现，他们中间的杰出者将会成为我们诗坛的重镇。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线将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所

共赏。这样的时代不久就会到来的。”周扬在发言中引用了10首“大跃进”民歌，并且让人编选110首“大跃进”民歌，汇成《新民歌百首》，作为发言的附件印发与会代表。

周扬的发言获得了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在第二天的大会上作第三次发言时说：“昨天，周扬同志在发言汇总中讲到民歌问题，讲得很好，所有的同志一直到支部，都要努力搜集民歌，每个乡出一集也好，全国有九万个乡，就出九万个集子，如果说多了，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管是老民歌、新民歌都要。发给每个人一张纸，请他把民歌写下来。”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负责汇集各地和各种报刊上的民歌给他。

新民歌运动不废收集，而偏重创作。我们可以从当时报纸的介绍中看到当时新民歌运动发展的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决定3~5年内要生产50万吨钢，搜集50万首民歌，把搜集民歌和生产钢并列在一起，内蒙全区更是要在5年内搜集1000万首民歌；安徽省巢县司集乡从“生产大跃进”以来，已创作了12万首民歌，到1958年底还要再创作60万首民歌；河北省委曾发起1000万首群众创作民歌的运动，结果被保定一个地区包了；山西省提出一年内产生30万个“李有才”和30万个“郭兰英”；四川仅141个县市的统计，到1958年10月为止，就编印了3733种民歌小册子。“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诗人千千万，李杜也寻常。”“要问民歌有几何，挤倒高山填满河。”要弄清当年全国到底创作了多少民歌，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各地新民歌创作是丰富多彩的。从形式上讲，有赛诗会、民歌演唱会、联唱会、田头赛诗会、战擂台、诗街会、诗人之家、父子赛诗台、母女赛诗台、夫妻赛诗台等。在一些地方的墙上、门上、山岩上、树干上、电线杆上、商店柜台上、酒桶上、磨盘上，到处都是诗和画。四川省叙永山区有一个7口之家，除了一个失明的老母和两个二三岁的孩子外，全都写诗，1958年10月以



前，一家就写诗3500多首。安徽诗歌之乡巢县司集乡，就创造了“迎风挂牌”、“望风采柳”的创作形式，即看到什么就唱什么，做什么事情就编什么。从内容来看，有歌颂党和领袖、水利兴修、除“四害”、农业放“卫星”、大炼钢铁、总路线、人民公社、教育革命、技术革命、移风易俗等，反映了从兴修水利开始的“大跃进”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

即使是出门旅行，也要加入新民歌创作的大潮。1958年11月，上海铁路列车段的乘务员做了一个有趣的统计，从3月起至10月底，上海列车段的“旅客意见簿”上，旅客们写下的诗歌有5300多首。直到1960年，一位作家由上海乘火车到杭州还被列车员邀请参加必须参加的赛诗会，规定每个乘客下车前必须至少写出一首诗。

我们可以从1959年郭沫若、周扬主持编辑出版的《红旗歌谣》中看到新民歌作品之一斑：

好不过毛泽东时代

高不过蓝天大不过海，好不过毛泽东时代，  
幸福的大路共产党开，青松翠柏我们栽。

端起巢湖当水瓢

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  
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

歌成海洋诗成山

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  
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须半杆烟。

一个谷穗不算长

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

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驰过不晃荡。

在“大跃进”中，《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〇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中的几首诗，引起毛泽东的特殊兴趣，说它们“很有意思，是一首诗”。其中一首是：

新乐园真正强，  
四面八方是楼房，  
有大学有工厂，  
公园街上百花香，  
柏油马路明又亮，  
汽车穿梭排成行，  
有电影有戏院，  
劳动以后去听唱，  
冬天室内有暖气，  
夏天开开电扇乘乘凉，  
生活真是大变样，  
万年幸福乐无疆。

在新民歌运动中，王老九、刘章、黄孝声、殷光兰、姜秀珍等一批民间歌手特别引人注目，其中除王老九是延安时期开始创作的农民诗人外，大部分都是新民歌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歌手。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的创作生命一直延续到80年代，如刘章、姜秀珍等。

文艺界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创作的洪流中去。文坛泰斗郭沫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题为《为今天的新国风，明天的新楚辞欢呼》的文章，满怀豪情地预言：“中国的新国风，将来恐怕要以亿为单位来计算。这同时是文艺生产上的大跃进。”接着，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大规模搜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诗人贺敬之也热情预言：“大跃进”民歌的出现，及它在诗歌创作上的影响，已经使我们看到“前无